

延安地区社会经济调查 及其改造设想

陈 年

我们中山大学社会学系85级研究生一行7人，于1986年7月12日至8月2日到延安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在延安行署办公室的建议和安排下，我们深入到子长、黄陵两县的4乡共8个村，与各级领导干部和农民群众广泛接触。共搜集统计资料、表格200余万字，召开各种座谈会、访问会26次；发、收问卷152份；调查谈话350余人次。回校后，在校、系有关方面的指导下，写成近10万字的《延安调查报告集》。其中主体报告《延安地区社会经济状况调查及其改造的设想》共55 000字，本文为该报告的摘要。

一、延安怪圈

延安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穷，二是水土流失。

先看穷：1984年，全区农业人口现金分配人均172.7元；最低的县人均102.8元。1985年人均193.3元，最低的县126.9元，若以200元为贫困线，延安地区1985年有7个县、市在此线下。据统计，1985年全区有贫困户57 600户含276 300人，分别占总农户和总人口的20%。其中特困户、特困人口占总农户和总农业人口的12%。

另外，地方财政长期处在靠输血、吃补贴的严重赤字财政状况下。财政自给率近年徘徊在35%上下（见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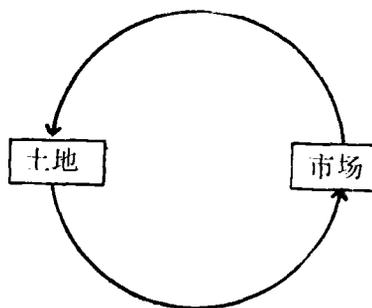
表1 延安地区历年财政自给率（%）

年 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自给率	23.18	23.41	27.27	34.81	39.06	38.58	34.26	35.78

资料来源：延安地委办等单位主编《延安概况》

图1 “延安怪圈”一般图示

再看水土流失：延安地区河流泥沙含量很高，一般在700-1 000公斤/米之间。全区水土流失面积为20 925.84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7%。北部6县水土流失面积多在70%以上；年平均侵蚀模数多为9 000吨/平方公里。其中吴旗县年水流失量为5 655万吨，年平均侵蚀模数为1.5吨/平方公里，为极强度。



我们认为，透过“一贫二流”的现象可以发现一个本质的问题，那就是存在着一个“延安怪圈”。所谓“延安怪圈”是这么一种现象：延安农民对土地的迷信，使他们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长期徘徊在土地与市场、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之间。（见图1）

我们用三个指标来证明“延安怪圈”的存在。一、延安地区村及村以下办工业从业人数历年变化；二、这些工业历年总产值变化；三、延安地区历年农业商品率变化。（见图2、图3、图4）。

图2 延安地区历年村及村以下办工业从业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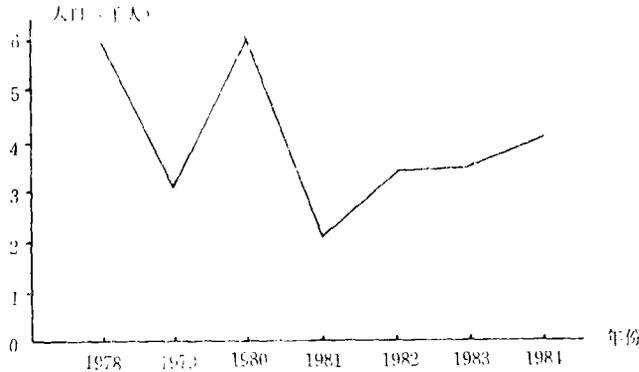


图3 延安地区村及村以下办工业历年总产值变化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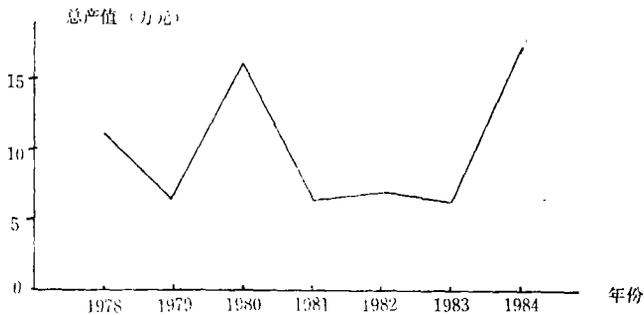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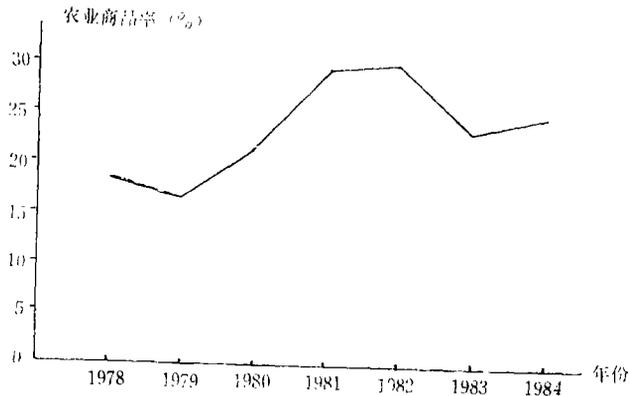


图4 延安地区农业商品率变化



① 该曲线未扣除历年物价的增长因素

图2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劳动力在工——农之间徘徊的情况。图三通过乡村工业总产值起落的情况反映劳动力的徘徊状态。图四通过农业商品率的起落表明农业在面向自然经济还是面向商品经济的选择中的徘徊情况。三个指标历年的涨落,反映了确实存在着一个“延安怪圈”:延安农民多年来在土地与市场、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之间徘徊。

延安农民的这种徘徊,表明了正是由于他们对土地的强烈依附性,致使自然经济得以较完整地保存,商品经济因市场得不到正常发育而不可能发展。对土地的强烈依附性,使“延安怪圈”成为当今水土流失的渊藪;商品经济不发达,使“怪圈”成为延安贫穷的拷贝。通过大量资料的分析表明,中国农民的这种徘徊现象具有普遍性。但是,如果把中国分为东、中、西三级梯度,则可发现,农民的徘徊强度由西向东递减。西部最强,中部次之,东部沿海最弱,徘徊强度与地区富裕程度成反比例,即徘徊强度越高,地区越穷;徘徊强度越低,地区越富。延安属高强度徘徊地区。

造成“延安怪圈”并使之逐步强化的社会、心理原因很多,比较突出的有6条:

1. 人少地多和土地贫瘠两大因素为广种薄收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

2. 把治理水土流失和脱贫致富分开考虑,农民感到致富是自己的事,治理是政府的事。要致富,得靠种地。因而掠夺性种植业生产日益加剧。1980年到1985年6年间,全区耕地总面积减少25.7万亩,递减4.8%。可1985年却多种了2.1万亩。形成“种——流——扩种——更流”的不可自拔的恶性循环。

3. 要求补偿的深层心理。延安许多农民反映:水土流失如此严重,和南泥湾大开荒、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山造田有直接渊源关系。因此,掠夺性种植在心理上合法化。战争时期延安人养活了中国革命,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延安地区的长期“输血”政策在心理上合法化。

4. 地方政府无法有效地为农民指引致富之路。著名的延安“懒兔事件”和子长县“洋芋成灾”均属农民投资预测错误的典型事例。

5. 近年来的扶贫工作部分存在“少、散、偏、挪”的现象。少:资金数量少;散:资金使用分散;偏:扶贫选点不合理;挪:扶贫款到基层相当数量被挪为他用。

如原给李家岔乡扶贫款共计为80 000元,而其中的31 300元被挪作他用,占总数39.12%。实投款48 700元中有2 345元投入种植户,形成贷——肥——粮年年单循环,用今年的钱,买明年的粮。养殖业投款有扩大再生产意义,可户均250元只能买到一条半牛腿。不难看出,一些扶贫贷款,“倾杯水救燎原之火”,很难发挥实际作用。

6. “无农不稳”的口号被小农意识化。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求每一户甚至每一个农民为他们自己搞粮食,使具有全国性战略意义的口号“无农不稳”随之小农意识化。1985年,本区农业总产值占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的70%;粮食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70.9%。即是说,延安粮食总产值占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的49.63%。可延安人决定在“七五”期间将全区粮食总产量从现在12亿斤增加到14亿斤,由现在人均产粮740斤提高到1 000斤。连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子长县,也要力争从现在的人均产粮599.5斤提高到800斤。这种大政方针上的“粮食拜物教”使恶性循环在政策上得到保证,并强化了农民小而全、不思进取的自然经济心理,从而把绝大多数农民拴在土地上,失去发展商品经济的动力和压力。

二、延安改造的设想

我们认为，要冲破“延安怪圈”，就要把“一贫二流”结合起来考虑，在农民没有强大动力的情况下，就应给予他们较大的压力。因此，我们设想的原则是：强化生产区域分工以加大风险；“县治小而缺、地治大而全”，以减轻政治控制力；分期治理以实现良性循环；大力发展中等城市以配合经济起飞。

（一）生产区域分工与环境分期治理

设想的根本依据为：南部6县1市粮食年产量可维持全区农民的温饱下限；自然条件表明本区北部比南部占有畜牧业优势，南部比北部占有种植业优势。如果把南部生产的粮食供给农民，情况如表二。

表2 南部对全区供粮的可能性

年	分 配 量	南 部 粮 食 总 分 配 量 (万斤)	全 区 农 业 人 口 人 均 可 分 配 量 (斤)
1984		65 623.7	486.8
1985		55 423.0	411.2

表2证明，南部6县1市为全区农民提供粮食是可能的。根据历年统计资料，北部6县的牛、羊出栏数均超过南部6县。根据上述两个条件，我们设想延安的区域分工和分期治理可分三期走。

第一期：把延安市以南（含延安市）6县1市划为全区粮食主要生产基地。令北部6县退出大部分山川和低质地种草种树，综合治理，发展畜牧业。粮食不足部分用畜牧产品与南部进行市场交换，并大力发展黄龙山一带的林业基地，形成非工业生产区域中北畜、南粮、中林区的分工格局。国家可将历年贷款、补贴用作此中贷款，扶持分工，并使畜牧业中逐步孕育出育种、育羔、产奶、产肉等一系列内部分工的萌芽；使农业内部逐步孕育出育种、植苗、沤肥、耕作、收割等内部分工的萌芽，打破以家庭为单位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格局。使农民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只有在地区内市场的交换中才可能齐备，让他们感到风险、竞争的压力。

第二期：俟北部畜牧业基地基本建立，水土流失缓解，则北部可适当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减轻南部农业负担，支援南部综合治理。同时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逐步形成农业部门内分工完整的集约化大生产。

第三期：南部水土流失缓解，延安农民的现代意识也在竞争中得到增强，延安作为一个系统，农、林、牧业部门内分工已较发达，则突出延安地区作为畜牧业基地的特点，参与陕、甘、宁地区的更大系统的区域性分工合作。

（二）地区内的县治问题

为了保证行政上给分工以有力的支持，有必要在延安试点，打破“以县为治”的小而全管理。不要强调每个县都象“复印件”似的同样结构——每个县长都是小小的“国务院总理”，每个县委书记都是小小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要剥夺县委书记、县长以农、林、牧、副、渔皆有，万事不向别人伸手的可能和自豪感。重新按地理条件进行县治地域规划。变“父母县”为“功能县”。县的辖地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县治功能以突出分工

功能为根本。视各县不同功能突出其中功能局、办、部、委。如分工为农业基地的县，以农业局为中轴运转；分工为畜牧基地的县，以畜牧局为中轴运转。与基地功能无关或关联小的局、办、部、委可实行“关、停、并、转、迁”的办法。行署各局、办、部、委大而全，分工包干功能县中的同类机构。地区大权独揽，各县分揽功能权，造成地区为系统，集大权以统分工的格局。各县裁减行政人员，可用者对口工作；不可用者降级或并入各企业。尔后政务员的铨选，可视功能县的特点，由上级主管局给出相应的技术鉴定与考核。

（三）中等城市的区位与功能

工业布局上，本区北油、南煤、中轻纺的格局已成雏型。因此，宜大力发展延安、黄陵、子长和延川（二县合一）三个中等城市，强化已有工业格局，增大城市对农村的文化辐射力，吸收分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子长和延川作为较大重工业基地并成为新技术、简单劳动力的容纳地。延安市作为与全区特点配套的畜牧业产品加工基地并侧重吸收在技术上可培养在农村剩余劳动力。黄陵作为辐射西安和全国各地文化窗口，应发展成以商业、旅游业为特点的综合型城市，辅以发展煤矿采掘加工，并成为有经商能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活动中心。我们认为，小城镇模式来自人多地少的沿海地区，若用于延安和同样的人少地广的西部贫困地区，其势必南辕北辙。除四川部分人口稠密地区外，大力发展中等城市是西部落后地区的重要出路。

三、设想的可行性证明

1. 延安地区目前占优势地位的计划经济和中国目前较集中的各级行政权力，是促使区域分工、改造县治、大力发展中等城市的有力杠杆。

2. 三个设想中，改造县治可能引起的社会震动和社会心理抵抗最强。但延安地区的干部在执行中央指示的时候，不象经济发达地区的干部善于“变通”。倘把延安作为试点，延安干部这种不善“变通”的传统，会大大减弱他们在行动上的对抗。事实上，珠江三角洲各县，近年来已有从“父母县”向“功能县”过渡的趋势。对于延安，无非是加入一个行政外力和经济引导力的问题。

3. 延安地区人少地广，城市人口压力很小。全区总劳动力44.6万人，季节性剩余劳动力占40%左右。如果大力发展三个中等城市，区域分工后完全脱离土地的20多万剩余劳动力流向这三个城市，不会增大人口压力，反而为较低水平的第二、第三产业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资源。

4. 延安行署在向中央领导的汇报中已明确指出“北油、南煤、中轻纺”的工业格局已成，这种工业格局为三个中等城市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先赋的结构。

5. 南部一马平川，北部山峦起伏，是延安区域分工得天独厚的地理格局。

1987年12月

作者工作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系（85级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宛丽